

贡献。

总之，徐润从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从事自己的商业活动，至 20 世纪致力自营工业生产，半个多世纪劳累奔波，在近代民族商业、矿业、工业中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进行抗争，为近代民族商业、矿业、工业的发展和争取应有的地位作出重要贡献；徐润作为近代民族资本家的典型代表，本能地表现出民族资本家的民族抗争性和民族反抗性。

第三节 买办、绅、商一体的徐润

徐润早期在宝顺洋行凭借伯父徐钰亭和叔父徐荣村的买办家庭背景和自己的灵活与随机应变，成为宝顺洋行的青年副总买办；也就是在买办期间徐润开始了他早期的商业活动，经营茶业、房地产、钱庄，1868 年后成为独立商人，到 1883 年成为“富甲沪上”大富豪；徐润又用买办期间经营和办实业赚来的钱捐官，1880 年捐得二品官衔，成为一个高品士绅。这就是集买办、绅、商于一体的徐润，这三种身份具有矛盾冲突的双重人格。作为买办，依附于洋行老板，表现为雇佣关系下地位的卑微，在人格上表现出绝对服从和忠实可靠；然而寄人篱下的生活使他在心理上一方面表现愤慨，另一方面表现刻苦好学，奋发努力，取得好的业绩博取主子的欢心与赏识，并以此作为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这种心理驱使的结果是为外国洋行拼命扩展在华业务，具有明显的奴役性。作为绅士，一方面独立或合股投资于中国近代商业和近代工业，是集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于一身的近代民族资本家；另一方面又用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捐纳官衔，成为晚清的二品大员。作为商人，一方面重利、争利、赢利；另一方面又利用公务之便谋私利，甚至挪用企业公款从事自己的商业业务，表现出商人的唯利性。徐润就是在这种矛盾冲突的两种人格中生存与发展。

一、双重心态的青年买办

19 世纪的中国买办实际上地位非常低下，主奴性质的雇佣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传统文化中贵贱和尊卑观点深刻影响下的晚清买办对洋行表现出绝对服从和忠实可靠。然而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使他在心理上一方面是表示愤慨，另一方面就是刻苦好学，奋发努力，取得好的业绩博取主子的欢心与赏识，并以此作为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这种心理驱使的结果是为外国洋行拼命扩展在华业务，具有明显的奴役性。

徐润到宝顺洋行工作后，因其伯父的庇护，加之自己的努力，表面上看是老板韦伯的亲信，与洋行的关系是雇佣关系，但却掩盖不了他们之间的主奴关系，掩盖不了寄人篱下的卑微。徐润于咸丰十一年（1861）代为“主账上堂督理各职”，宝顺洋行的行东韦伯（E. Weber）训话：“今君乃总行中华人头目，如有差错捺报，惟君是问。”^① 徐润是韦伯的亲信买办，其伯父徐钰亭又担任“主账上堂督理各职”多年。在这种人际关系下主奴关系还如此淋漓尽致，其他买办就可见一斑。徐润的好友怡和洋行大买办唐廷枢，十年买办的生涯得出的结论是充满不信任和屈辱。

这种主奴关系和寄人篱下的卑微表现在徐润对洋行的人身依附及思想潜意识的服从上。徐润记载洋行老板韦伯氏职满回国临别赠言：“上海市面此后必大，汝于地产上颇有大志，再贡数语：如扬子江路至十六铺地场最妙，此外则南京、河南、福州、四川等路可以接通，新老北门直北至美租界各段地基，尔尽可有一文置一文。”^② 徐润对此深表佩服，并且按照韦伯氏的临别赠言发展自己的房地产业，1883年徐润购地2900余亩，造屋2640间时，甚至到编写《徐愚斋自叙年谱》时还对韦伯氏的临别赠言大为感慨：“历验所言，果有成效，足徵先见之明。”^③ 可见洋行买办对徐润一生事业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为了摆脱命运的十字架，他只能刻苦好学，努力工作，百折不挠去面对现实，面对工作。学习上他不但“学丝、学茶，不分彼此，”^④ “春学丝缕，秋学茶；”^⑤ 而且“黎明即起习字数百，又学算于阙筑甫。”^⑥ 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连洋行的外国技师都非常赞许：“韦伯氏见余之勤也，许为志不可量。”^⑦ 在工作上徐润极力为宝顺洋行在商业、贸易、航运、鸦片等方面拓展业务，在人格上具有明显的奴役与服从特征，在经济利益上具有明显寄生特性。1860年试开日本长崎埠，开展对日本的贸易。“行中调派杨辉山、杨明轩、郑陶斋、吴茂川、黄毓斋各友司理丝茶栈房，揽载诸务。派杨明轩坐允德一枝半桅小夹板船，试开东洋之长崎埠，续派晏多你生即蔡焯麟在长崎埠管账。”^⑧ 从此，宝顺洋行开日本东洋贸易。

① 前揭《洋务运动》，第8册，第94页。

②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12-13页。

③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13页。

④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3页。

⑤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4页。

⑥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3页。

⑦ 前揭《洋务运动》，第8册，第88页。

⑧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6页。

1861年，徐润充任主账上堂督理各职，使宝顺洋行生意盛极一时。“上半年派去各埠办房如烟台梁枝，天津亚培、徐子荣，牛庄陈洛明，镇江黄墨砚，芜湖窦燕山西友，九江徐渭南、郑济东，汉口盛恒山、杨辉山，君皆相好，仍须每期轮船照旧通信报市面新闻，并各货交易行情；”^①“至宝顺行生意，进口货如大小洋药装公司船来者各有数千箱，又夹板船装来洋货约有三四十船，每船千余吨，另有南洋暹罗、新加坡各埠运来檀香、苏木、沙藤、树皮、胡椒、点铜四五船，至于出口货如湖丝、棉花、红绿茶各等约值千万，连东洋、北三口、长江一带、香港、福州进出，并计总在数千万，实一时之盛，洋行中可屈首一指者也。”^②经过徐润经营、管理、调度，宝顺洋行向国内的烟台、天津、牛庄、镇江、芜湖、九江、汉口等派专人管理，“君皆相好”，各口生意顺畅；进出口贸易发达，进口南洋暹罗、新加坡各埠的檀香、苏木、沙藤、树皮、胡椒、点铜，出口湖丝、棉花、红绿茶，进出口贸易总额达数千万，在各洋行中首屈一指。

航运业发达，洋行拥有江轮四艘，夹板小船两艘。“当时有长江轮船四只：一总督，二飞似海马，三气拉度，四哥素么布礼。另申港轮船两只：一扬子，二鲤鱼门。又小夹板船二只：一允德，二米湿化。各船之中以总督一船获利最厚，盖成本轻，载货多。”^③宝顺洋行轮船在客运和货运生意中赚取丰厚利润。“缘彼时客位每客价银七十五两，每吨货价银二十五两，往来一律，加以下水时拖带本地钓钩船四艘，或带镇江，或交上海，每艘装货五六百吨，每吨水脚价十五两，故获利最厚。”^④

徐润还参与了宝顺洋行罪恶的鸦片贸易。宝顺洋行是最早从事罪恶的鸦片贸易的洋行之一。与林则徐的禁烟运动相对抗的大鸦片贩子颠地就是宝顺洋行的创办人之一。徐润到宝顺洋行时的大班韦伯氏也是一个大鸦片贩子。1861年，徐润充任主账上堂督理各职时，洋行韦伯氏交代鸦片贸易价格大涨，应认真考查。“至大小洋药价目，上落尤大，此事更当认真考查。”^⑤此后，徐润对鸦片贸易非常卖力。1861年徐润主持下的宝顺洋行贸易，其鸦片贸易是大宗贸易，进口鸦片数千箱，“进口货如大小洋药装公司船来者各有数千箱。”^⑥数千箱鸦片给宝顺洋行带来巨额利润，也给中国人民的健康带来巨大的危害。

以上就是青年买办徐润复杂、矛盾的心态和矛盾冲突双重人格的集中体现，

① 前揭《洋务运动》，第8册，第96页。

②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9页。

③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9页。

④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9页。

⑤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8页。

⑥ 前揭《洋务运动》，第8册，第96页。

卑微的地位、绝对服从的心态驱使他极力为宝顺洋行在商业、贸易、航运、鸦片等方面出谋划策、铺路搭桥、开辟市场、拓展业务，具有明显的奴役性与寄生性。

二、近代化实业家与绅士的双重身份

徐润具有近代化实业家与绅士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他独立或合股投资于中国近代商业和近代工业，是集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于一身的近代民族资本家；另一方面他又用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捐纳官衔，成为晚清的二品大员。

（一）工业、商业资本家的徐润

徐润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时代，轮船、铁路、电讯、股份制、保险等都是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的事情，但他作为实业家，在中国近代过程中敢于冒风险，敢于创新。他创办招商轮船局，开创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先河。他把股份制和保险业引入中国航运事业，在创办招商轮船局的过程中带头认股，前后四十八万；他创办保险局、仁和水险公司、济和水险公司，在维护民族航业、保障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徐润致力于中国近代矿业20年，先后投资过平泉铜矿、宜昌鹤峰州铜矿、孤山子银矿、三山银矿、天华银矿、潭州银矿、建平金矿、金州煤矿、贵池煤矿等10余处矿产，为开创中国近代采矿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徐润还积极创办民营企业，先后投资同文书局，景纶袜衫厂，上海虹口伦章造纸公司，粤东自来水公司，香港利远糖榨公司（香港第一家华商糖厂），烟台缫丝局，华兴、华安保险公司，玻璃公司，电车公司，牛奶公司等。徐润在这些工矿企业，引进近代的管理制度，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重用外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大大提高了近代工矿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促进了近代生产率的发展，徐润不愧为中国近代的工业资本家。

徐润积极开展自己的商业活动，经营茶业最为成功，徐润号称“近代茶王”。经营房地产也一度非常成功，号称“地产大王。”此外，还经营绸庄、布庄、典当、钱庄等，与人合开宝源丝茶土号、立顺兴川汉各货号、元昌绸庄、成号布庄、协记钱庄，其经营项目包括丝、菜、麻、棉、烟草、桐油、烟土等。他从事商业活动从上海到浙赣山区，从长江中下游口岸到沿海各埠均有他的足迹，并将业务的触角伸至日本长崎。徐润在开展自己的商业活动中，利用自己早年学习商业知识，按照近代商业规则，遵循市场规律，积累了可观的资金，徐润是中国近代商业资本家的典型代表。

（二）二品绅官徐润

然而，近代化程度极深的实业家徐润具有强烈的官本位意识，时刻不忘通过

捐纳官衔来提高自己在半封建社会中的社会地位。

下面我们看徐润六十六岁时填写的一份履历表的部分内容。

由监生遵筹饷例报捐光禄寺署正。同治二年六月在江南粮台报销局加捐员外郎，并捐花翎。四年十一月在上海皖营捐轮分局报捐指分兵部。五年八月蒙前北洋大臣直隶爵阁督宪李。前在两江督院任内于苏军分援浙闽三省叠克城隘转运出力案内保奏。是年八月二十九日奉上谕徐润着赏四品衔钦此。……十一年十二月遵筹饷例在皖捐局报捐郎中双月选用，并免保举。……蒙前北洋大臣直隶爵阁督宪李以江苏办津赈出力保奏，请加随带二级。五月二十二日奉旨依议钦此。二年闰五月在江苏上海甘黔皖统捐局报捐道员双月选用。嗣蒙前兼署湖广总督湖北抚宪翁于办理江鄂元年分漕粮海运出力案内保奏请交部议叙。三年四月初三日奉旨依议钦此。又办理江鄂二年分漕粮海运出力蒙前湖广督宪李会案奏保请加二品衔。四年六月初五日奉旨依议钦此。五年在直隶晋赈局遵例报捐三班指分浙江试用。六年十月蒙前北洋大臣直隶爵阁督宪李、前任福建巡抚丁会同奏保潮州等处劝办晋赈出力案内，请以本班优先补用。^①

这份履历表的主要内容就是炫耀徐润自己通过捐纳官衔和通过办漕粮、海运、晋赈及协助清政府镇压农民起义而由一个大买办跻身于晚清王朝大官的过程。1862年，徐润二十五岁由监生报捐光禄寺署正，1863年报捐员外郎，并捐花翎，1865年报捐指分兵部学习行走，1866年奉上谕赏徐润四品衔，1872年报捐郎中双月选用，1878年保奏加二品衔，1880年保奏以道员本班优先补用。这样徐润在十八年时间内就由一个青年买办跻身到清王朝的二品大员。徐润通过捐纳官衔和自身努力而跻身到清王朝二品大员的行列是晚清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在晚清社会，人们以官本位为中心，一个布衣商人不管你有多雄厚的经济实力，只要你与晚清的社会，与晚清的官僚体系发生关系就会感觉到自卑，感觉到无靠；即使是大买办商人，有洋行、洋商作背景，也不能逃离这一社会制约，也不能逃离这一社会现象。所以徐润这一封建性的体现，是时代与社会的局限。

但徐润的红顶子也充满血腥性。1866年，李鸿章调兵到浙江、福建镇压太平天国的余部，徐润用自己的船只为准军转运粮饷、军械而得李鸿章赏识保奏加四品官衔；另外，徐润五次捐官，三次是捐给李鸿章的安徽大营，李鸿章利用这

^① 前揭《北岭徐氏宗谱》卷6，《世纪录》，第1-3页。又见前揭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114页。

些捐款充当军饷，镇压 19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的方兴未艾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这就是徐润封建性中的血腥性。

徐润近代化实业家与绅士的双重身份、双重人格是当时特定社会的产物，也是历史人物无法逾越时代的产物。

三、重利与唯利的商人人格特征

徐润作为晚清的一个工商实业家，重利、争利、赢利是一个商人的正常人格特征；但另一方面却又利用公务之便谋私利，甚至挪用企业公款从事自己的商业业务，表现出商人唯利的消极人格。徐润就是在这种矛盾冲突的两种人格中生存与发展。

（一）一个商人的正常人格特征

徐润作为晚清集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于一体的典范，他必须按市场规律运作，追求工业利润和商业利润，才能扩大再生产。事实上徐润在商业和工业中也赚得了巨额利润。在买办和早期商业活动中他的总收入为 137.9218 万两^①；改组轮船招商局他个人入股 48 万；开平煤矿入股 15 万；此外，还先后投资诸矿：投资贵池煤矿 10 万，投资三山银矿 6 万，投资平泉铜矿 6 万，投资金州煤矿 5 万，投资宜昌鹤峰州煤矿 1 万。创办民营企业也投入大量资金，独立承办景纶袜衫厂时就已投入 17 万之巨。这些工业和商业利润是徐润凭自己的资本、智慧、劳动等赚取的合乎市场规律运作的合法收入，体现了一个商人的正常人格特征。

（二）一个商人唯利的消极人格特征

但是利用公务之便谋私利，甚至挪用企业公款从事自己的商业业务，表现出徐润作为商人唯利的消极人格特征。

1. 徐润挪用招商局公款开办房产公司，从事房产投机生意

在 1873 至 1883 年之间，徐润和唐廷枢掌管轮船招商局的实权，形成“非唐即徐”^②的局面，徐润等有“挪用银两，无从追缴”^③的现象。徐润挪用局款达十六万两之巨，唐廷枢“借（局）银二十五万，二十万归局用，五万则擅抵私欠。”^④而局内大小局员也存在借公款购买股票的现象，上涨赚钱归自己，下跌

^① 徐润的资金积累尚无人专门研究，今人的著作或文章关于 1883 年徐润的资产也是根据前揭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 34-35 页的记载来统计，包括房地产 2 236 940 两，各项股票 341 530 两，合业典当架本 244 000 两，股票抵押各欠 397 000 两，合共 3 219 470 两。

^② 朱维铮：《马相伯集》，卷 1《改组招商局建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

^③ 前揭《马相伯集》，卷 1《改组招商局建议》。

^④ 前揭《马相伯集》，卷 1《改组招商局建议》。

则“在局照股本押银”。^①作为会办的徐润在思想上是有偏差的，不但纵容挪用局款的现象，而且带头挪用局款，直到1885年被革职时，所欠银十六万二千余两，“前交银七千余两，又以房地产契抵银十四数千两，核计尚未足数。”^②李鸿章对此评价说：“日久弊生，假公济私，驯至亏欠局款。”^③徐润的思想中实质存在公私不分、损公为私和缺乏对公司的诚信的消极、落后、腐败思想。

2. 徐润等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在经济外事活动中也存在借企业利益为自身谋利的现象

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分析，徐润等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没有直接的营私舞弊的情况，尽管王先谦告唐廷枢、盛宣怀、徐润等“以公项私买旗昌股票，抵数扣帑入己，旗昌原本已亏，收买时仍照原本开银。”^④但李鸿章对此驳斥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值得信服，其理由是：付款由南洋拨给官款银一百万两，分期交付旗昌洋商。而由各商凑集的一百二十二万两白银并未足数，仅招商股四万余两，“未践原禀之言，致有疑为诡诈者。”

而借企业利益为自身谋利的现象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收取厘金。在近代中外交易中，洋商通常给经办人一定比例的厘金，徐润等在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中收取厘金应是事实，因为他既是发起者，又是资金的经手者。连李鸿章对洋商给予厘金也不回避，甚至还作了说明“洋商房产交易，向有五厘中金，分给经手之人，……买价至二百余万之多，应提花红银数不少，盛宣怀等主持其事，即使毫不沾染，难免群疑众谤。”^⑤二是持有旗昌股票。徐润、唐廷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俩虽然是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和会办，但他们都有自己的经济实体，或合股，或独办。自身的经济利益必然对他俩在轮船招商局的经济决策产生深刻影响。李鸿章认为“至旗昌股票，唐廷枢、徐润或有一二。”^⑥的确，这项交易一经实现，立即使市场上跌到只值60到66两的旗昌轮船公司面值100两的股票立即回升，持票人竟然可以分得103两的利益。这对唐廷枢、徐润个人经济利益的维护和增长起到了有利的促进作用。三是徐润与旗昌洋行保持的密切关系也是影响他决策的重要原因。徐润除拥有旗昌股票外，还与旗昌洋行保持密切的关系，1873年，旗昌洋行还盛邀徐润担任上海买办。

综上所述，经济关系和人际交往的原因都促使徐润作出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

① 前揭《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175页。

② 李鸿章：《革徐润、张鸿禄职片》，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中旬，前揭《盛宣怀年谱长编》，第225页。

③ 李鸿章：《革徐润、张鸿禄职片》，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中旬，前揭《盛宣怀年谱长编》，第225页。

④ 《谕折·光绪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奏》，前揭《洋务运动》第6册，第38页。

⑤ 《谕折·光绪七年二月十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前揭《洋务运动》第6册，第52页。

⑥ 《谕折·光绪七年二月十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前揭《洋务运动》第6册，第52页。

决定，特别是这一决定既有利于招商局的发展壮大，又能满足他借企业利益来谋取自身利益，因此迅速决定收购和未深入调查研究就决定收购就很自然，也很符合徐润当时的心理选择，也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一个商人趋利、唯利心态的集中体现。

一个商人的双重人格特征，也是徐润矛盾冲突的心理、道德特质的反映，是资本运作不规范、市场发育不成熟的结果。

四、徐润晚期的消极与颓废

买办、绅、商一体的徐润明显体现出徐润的双重心态、两种身份、两种人格特征，这种特征的矛盾与冲突导致徐润后期思想和行为的颓废性。

徐润后期的思想中颓废思想很突出和明显。徐润后期遭受打击、历经坎坷，其意志与性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消磨。

徐润后期的思想中颓废思想最集中的表现是1892年徐润55岁时的一段人生感慨和十年后的1902年《愚斋小记一》。1892年的徐润历经房地产一败涂地的磨难，历经被清廷革职的处分，历经人间沧桑世变，加之长年跋山涉水开发矿业，所有这一切都对年过半百的徐润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徐润在《徐愚斋自叙年谱》中有很典型的表露：

涉世阅历兮，不避艰辛。吾年五十有五兮，犹欣可振。夫精神或衣冠而敦揖让兮，唯恭敬以自循；登山越岭以游览兮，初不倦；夫仆马风尘入煤井以监察兮，宜短褐以便身；服其服兮，事其事；随所遇兮，适吾志乐天下之命兮，听其位置，雨之自识^①。

1892年55岁的徐润在经历人生涉世、阅历、艰辛后，明显表现出“乐天下之命”是“吾志”的感叹，这种老庄式人生处世思想是徐润人生的转折，“恭敬”“自循”及无赖、苦涩、宿命的思想气息充置于字里行间，“服其服兮，事其事”成为处世的原则，表现民族资产阶级的徐润颓废思想在徐润晚年思想中占据了一定地位，徐润由积极进取走向消极与落后。1902年徐润65岁作《愚斋小记一》，颓废思想进一步加深。下面是《愚斋小记一》的内容：

^①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73页。

余于淞北寄庐以愚名斋，溯自五十年来无往不愚，故晚号愚斋。……倘后人能愚余之愚而不自以为愚，亦可为愚斋之肖子矣，复何奢望乎？作愚斋小记^①。

从徐润后期的思想来看虽有进取的一面，虽然在矿业、私营企业和二进招商局后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二十年前艰苦创业、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徐润形成鲜明对比，其主观意志和独立思想走向消极与颓废。

在近代中国社会，缺乏强有力依靠的民族资产阶级徐润由于自身不足，在买办、绅、商三位一体和双重身份、双重人格压力下的徐润内心世界是复杂和痛苦的，历经坎坷和磨难后走向消极与颓废是时代的局限，是阶级的局限，是民族资产阶级整体软弱性和妥协性的集中表现。

^①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101-102页。